

经济改革中的 争议性问题

——来自国外经济学家的论述

周小川 编译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中财 B0000836

经济改革中的争议性问题

——来自国外经济学家的论述

周小川 编译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章

总号 380118

书号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经济改革中的争议性问题
——来自国外经济学家的论述

周小川 编译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28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8.75印张 226千字

1990年12月 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004-200-6/F·131

定价: 4.50元

序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之中存在着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这不仅是经济学知识和经验分析的用武之地，更是关系到亿万人民利益和命运的关键所在。

经济学和关于经济改革的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于政治的和社会的环境，为政治和社会服务；经济学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但经济学的主流仍是探讨在不同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及如何运用客观规律。实践也证明存在着这种规律。我国当前面临和关心的经济问题，大多数也是经济学和经济史学中所关注的。通过科学分析、历史经验和横向国际经验的对比，能使学者之间有共同的或接近的语言。

每个国家的经济都有与众不同的环境、条件和特色，不能盲目照搬任何一种现成的模式。特别是要重视政治、社会、自然环境等的具体条件。当然，这并不能排斥借鉴别国经验。国外经济学中凡属科学的分析工具，也要拿来为我所用。

周小川同志在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之中，还特别注意那些国际上有价值的、与我国现实政策有密切联系的论著，自己动手翻译、编译或校核，向经济工作者推荐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论文。这本书的选题覆盖了近几年我国关于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方面大量的存在争议的问题，其中有一半是今年出现的最新论文。相信读者是会有兴趣的。

本书以“经济改革中的争议性问题”为名，副标题是：来自国外经济学家的论述。言外之意是后续着：来自国内经济界的以及作者本人的论述，这将是更有意义的。

刘 国 光

1989年12月15日

目 录

序.....	(1)
1.抑制通货膨胀提高竞争能力.....	(1)
2.东亚模式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16)
3.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范围.....	(25)
4.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性与可比性.....	(46)
5.产业政策的回顾与分析.....	(64)
6.苏联的改革是行动,还是停留在口头上?	(89)
7.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管理与经济发展.....	(103)
8.评改革经济学的学术质量.....	(117)
9.中国城市工业经济的财税改革.....	(126)
10.中国的价格体系和资源配置模式.....	(143)
11.中国地方政府在计划和市场中的作用.....	(162)
12.金融政策的争议焦点是发展中经济的 利率与汇率.....	(174)
13.贸易放开经营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经验.....	(186)
14.苏联卢布所面临的困境.....	(207)
15.发展中国家引入浮动汇率制获得成功.....	(214)
16.印度小企业的发展.....	(226)
17.交叉持股与所有者的最终控制权.....	(241)
18.农业体制与政策的对比.....	(247)
19.改革经济学思路的演进与分类.....	(262)
参考文献.....	(271)
编辑的话.....	(274)

1 抑制通货膨胀提高竞争能力

• 1 9 8 9 •

按语：本文是印度尼西亚总统经济顾问阿里·瓦尔德哈那在1989年1月第24届东南亚中央银行行长联席会议(曼谷)上的讲演。由于我国与印度尼西亚曾一度中断了外交关系，我国学者对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了解较少。最近，从亚太地区的学术活动中发现，印度尼西亚近两年的发展很快，出口和外商投资尤为明显，一些东南亚和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正试图把它当作一个榜样，吸取有益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亚所遇到的通货膨胀压力、稳定经济的需要及结构调整的要求，不仅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问题，更是我国经济学家当前特别关注的、热烈争论的问题。

由于80年代中期的石油跌价、印尼的石油产量递减及长期地过度保护本国工业等原因，印尼面临通货膨胀和本国经济效益太低(称之为“高代价”经济)的问题。印尼政府决定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对策。几年来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制成品出口每两年翻一番，通胀已被控制住，体制上实现了转变，有迹象表明印尼正处于起飞预备阶段并可能成为第二批“新兴工业国”的一员。印尼的稳定经济、结构调整与我国有某些类似之处，但治理、调整的办法却另有特点，可供我们研究和参考。

我很幸运曾在1976年和1983年的东南亚中央银行行长联席会议上讲过话，这次又能面对各位行长和经济学家讲话是很大的荣幸。

我选择的题目是“结构调整”，这里的各位对此都有深刻的见

解，我不可能从一般命题的角度增进大家的知识，我只集中谈印度尼西亚的结构调整问题，并希望有助于增进这方面的知识和共享我国所获得的经验。

印尼一直处于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经济改革也是结构调整的另一个类同词，这一过程至少已有5年时间了。这期间我们获取许多经验，也学习了许多关于改革进程的知识。印尼的经验不那么容易移植到别国，但也有些经验教训会对那些处于经济改革的艰苦路程中的国家有用处。我今天的任务是描述印尼的经历，而把抽取对你们各国有用的结论或增进对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的一般理解的任务留给你们自己。

一、印尼进行结构调整的原因

正如你们所知，经济改革的发生几乎都不是来自于改革自身所包含的道理。改革的压力总是来自于某种危机：外部价格冲击、国内经济条件的突变或政治环境及压力的变迁等。在印尼，我们的危机来自于1985年开始的世界油价疲软，在这种冲击之下，经济分析的简单逻辑关系清楚地表明，经济政策制定者必须坚定地走上结构调整之路：

——经济增长与发展是政府政策的中心目标。

——经济增长需要出口的增长以便换取进口并偿还债务。

——由于油价及印尼探明石油储量的不确定性，印尼唯一可靠的增加出口的来源是扩大非石油产品出口，主要是农产品和制成品。

非石油出口的增长需要一个有效率的、低成本的生产型经济，以使厂商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这又反过来要求有一个竞争性的国内市场。

——保护政策和政府管制是多年来选用的政策工具，但这是

与形成竞争性国内市场相敌对的，它们造成了“高代价”经济。这正是我们想要避免的经济。

——为了鼓励出口和经济增长，我们需要废除保护政策和政府管制；对我们的经济实行解除管制。

——如果政府要在发展中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必须使石油以外的政府收入有所增加。

——解除管制与经济增长的好处必须广泛地、比较平均地在全体人民中分享。特别是在任何一组改革中都应始终强调农村地区的发展。

我们在印尼开展的所有改革，从非石油出口的发展与增长到解除管制和更多地依靠竞争性更强的市场，都是由上述逻辑关系链条所指导的。

二、经济稳定化是改革的一个先决条件

在我们探讨印尼所实践的结构调整之前，我应该花些时间讨论经济改革的一个先决条件——经济稳定化。正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所说的，稳定经济与结构调整是并行的。如你们所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讲稳定经济，世界银行常讲结构调整。在第三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经济计划总发生在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之前，这是很有道理的。经济改革很难在不稳定的、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中生根发展。

这里有三个原因：

第一，通货膨胀扭曲了作为结构调整核心的价格激励。在一个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大量的利润是靠与通货膨胀合拍而赚取的。许多最有才干的企业家和实业家花费他们最主要的精力去利用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投资和其它活动中的机遇，他们必然忽视那些增加效率和提高生产率但却收益较小的行动。由于生产率的增

长是经济发展的实质,因此,通货膨胀使资源分配背离了发展的需要,通货膨胀会使市场导向的改革失效,因此,没有多大的理由在这种环境中来启动改革。

第二,伴随着经济不稳定而产生的各种危机把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管理者的注意力从为改革掌舵的艰苦任务中吸引开。任何一个国家的管理总能力是有限的,任何领导人如果被国际收支平衡危机或难以维持的预算赤字所困扰的话,他自己明白他几乎剩不下什么精力去对付关税改革或建立金融市场之类的改革。

第三,稳定经济计划的许多内容也是结构调整的实质内容。理顺高估的汇率和调整利率将产生积极的实际收益,维持财政预算平衡将把更多的资源转移到民营者手中,这一类稳定经济的组成部分正是结构调整的开始。

在印度尼西亚,我们很早就认识到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是所有其它经济政策的前提。即便在石油大增产和行情很好的70年代,我们也保持着预算平衡,在当今更为困难的环境下,我们一直坚持这一平衡预算政策。70年代中期发生的帕塔米那事件后来变坏事为好事,因为它教育我们一定要谨慎对待外债政策,在全球性债务危机全面降临之前我们对于过度借债的危险已有所提防。在那以后,谨慎成了我们的政策。因此,我们不象其它石油出口国那样负债过重,在石油大增产的年代,我们还本付息率也较为适中。1981年是9%,1985年是18%。

然而,当我们因丰厚的石油收入而喜悦之时,我们预见到以后可能不那么幸运。早在1978年我们就把出口多样化定为国策,并把卢比贬值34%(针对美元)以便刺激非石油的出口,还谨防非石油经济中所谓“荷兰病”的影响。我们所关心的一个原则是用较高的激励来保护农民的收入,以便鼓励农民为国内市场和生产许多出口产品去种植稻谷。在1983年,即石油大跌价之前的3年,我们进行了税收改革,提高了来自非石油产品的税收收入,对所得税实行了大检查,引入了增值税。目前,增值税收入占全部国

内收入的1/5以上。

在油价下跌后的三年之中，我们稳定经济的努力更为加强了。过去对预算平衡的小心谨慎进一步变为预算节制的苦行政策。作为危机程度的度量，在印尼的政府收入（国内收入，不包括外援）中来自油气的收入份额从1984年的65%下降到本财政年度的10%。公务员工资冻结了四年，发展用投资从198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7%。下降为1988年的5.9%。削减到只剩骨头了。整个政府开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削减了一到二个百分点；使整个政府净花销（扣除还债）下降到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

在控制预算的同时，我们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对待上升的货币压力。货币流通量的增长一直受到有效控制，为了对付资本的投机性外流，我们采取了收缩国内信贷和提高国内利率的方法。这种谨慎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之一是在本币对美元贬值31%的情况下（1986年）使通货膨胀的压力受到有效控制。在1986和1987年，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大约9%，1988年估计为6%~7%。

正如你们所知，近几年来国际货币关系发生显著的调整，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显著贬值，再加上同时而来的油价疲软，印尼处于两面夹攻之中。印尼的外债有40%是日元债务，20%是其它非美元债务，因此债务的美元价值剧增；同时油价下跌又使还本付息的财力大为减弱。我们估算，美元贬值使印尼的1985年还本付息量增加了约16亿美元，即增加了40%。同时油价下跌在我们1986年的出口收入中损失了60亿美元。1986年以后油价略有回升。

其结果我们不得不继续借债，并为保持还本付息能力在限度之内而斗争。还本付息量已上升到政府常规预算的一半以上，因此必须实行预算节制。幸亏我们正在进行结构改革的计划，再加上一些双边、多边的贷款，使我们有充分的资源避免了危机。实际上，1985年以来，外汇储备一直保持在6个月进口价值的水平上。

这就是我们生存的战略：稳定经济，就象是军队战前要整装待发，等候反击的时刻。为了准备反击我们进行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即便在我们稳定经济的奋斗之中我们也保留了重新增长的因素。

三、结构调整的内容

结构调整是一个覆盖许多经济管理范畴的大概念。为了集中分析印尼的经验，请允许我略作简化，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我们认为结构调整有三个基本内容，这就是：“理顺价格关系；发挥市场作用；改革政府机构。”

“理顺价格关系”在至少近10年来已成为经济改革的关键部分。经济学家讲这句话意味着调整那些关键的价格使其反映短缺商品和资源的实际价值。生产者和消费者如果要想最有效地分配资源，就必须使外汇、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其它资源的交易建立在真实的短缺性价值的基础上。多数经济学家都假定市场是“正确”价格的最好的仲裁者，但也不见得都是如此。实际上，大多数政府都小心地管理着一些最为重要的价格：汇率、利率、基本食品价格等，它们常由政府控制或受政府的影响，而不是留给市场力量独自去确定。但是，这些政府控制的价格也可以通过良好地管理达到“正确性”，即“理顺”。

这也就导出了结构调整的第二个内容：“发挥市场作用”。让市场来确定价格的优点之一是把政府经济管理者的精力解放出来去关注那些实质性的改革。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比较自由的市场将带来更多的竞争。而竞争又强制所有的生产者关注他们的成本，与此同时就提高了生产率。我们可以观察那些面对国外竞争的开放型经济，在它们之中自由竞争制度程度越高者，通常生产率增长收益也越大，经济增长就越快。这个经验过去曾限定在西

方和第三世界的混合经济中，如今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在学习这个经验。在一个竞争性的环境中，利润动机——这也许是人类最强的动机之一——就正好变为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提高福利的工具。

然而，更自由的市场制度不可能是靠签署个决定就办得到的，要想让市场决定更多的事情也需要政府官僚去做几件必要的事情，不仅是要减少官僚主义，还要让官僚们担负新的角色。政府官僚需要改变过去对民营经济的干预，转而去促进民营经济。这就要求转变职能和态度，即结构调整的第三个内容——改革政府机构。经济学家们经常忽略或跨越这个内容，而上层管理者，则经常回避这个任务，因为往往要花几年时间去转变这些官僚。但是如果不进行机构改革，老的官僚们就按老路子办事，就会窒息改革措施所要带来的竞争效果并扼杀经济改革者的设想。

我将就印尼的结构调整顺次，讨论和描述这三个基本内容：理顺价格关系；发挥市场作用；改革政府机构。

1. 理顺价格关系

在这里没必要去提醒你们这些中央银行的著名专家说汇率大概是什么任何开放经济中最最重要的价格。除非汇率去逼近它的均衡点，其它改革很容易把事情弄得更糟而不是更好。1978年以来，印尼一直在积极使用汇率作为促进非石油出口的工具。1978年我们把卢比对美元贬值了34%，1983年又贬值了28%。但那两次贬值时，国内通货膨胀几乎淹没了贬值的效果。因此，在1986年我们又贬值了31%。从那以后，我们努力保持甚至提高贬值(1986)以后的卢比的实际价值。这就保持了对出口者的激励，给了我们一个坚实的起点去出台那些为促进非石油出口而设计的其它改革。

汇率对整个印度尼西亚都十分重要。在农村，它为谷物出口的生产者提供激励和收入。然而，稻米的国内价格对农民的福利和低收入消费者也许是更为重要的，1968年以来政府收购并储存稻米以使其价格不跌过最低限度。近年来我们采用的办法则是最

低保护价，并使它近似等于印尼进口稻米的世界市场长期趋势价格，但在国内稻米价随长期趋势价格浮动时不允许这个价格跟随国际市场的短期波动。实际上，我们试图平滑这些波动以稳定稻农的收入和消费者的购买力。

世界价格的趋势使我们近年来不断提高稻米的实际价格，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在维持对化肥和灌溉投资的补贴的同时，我们于1977年快速普及新的多种品种的良好种子。这种价格政策使我们能维持稻米自给并刺激了农村的发展。

2. 发挥市场作用

印尼结构调整中所作的很大的努力是众所周知的所谓“解除管制”，这就是我所称的“发挥市场作用”的改革内容。我们在两个领域获得了重要的收益：贸易解除管制和金融市场解除管制。

俗话说，好东西都放在一个小篮子里；在印尼，经济改革都来自一个我们称之为“解除管制的一揽子计划”之中。在1986年5月、10月，1987年1月、11月，1988年11月，我们宣布了五个贸易解除管制的政策（是个一揽子计划），1986年10月之前，有1200个品目的进口项目受到某种形式的非关税壁垒，通常是使用进口许可证限制并只允许一个或少数几个公司进口某一类商品。这种限制占进口总价值量的35%，对这些项目提供了高度的保护（保护民族工业）。这些限制损伤了那些受到较少保护，但又不得不购买受保护的进口品的厂商，特别是出口厂商。贸易解除管制在制造行业引入了竞争，这首先是通过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其次是通过降低进口成本来实现的。

1986年5月宣布解除管制计划是对阻碍出口的高代价经济的直接进攻。这个计划把不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出口补贴制度改为退税和免税制度，使出口者免于承担进口税和销售税。同样重要的事是，这个计划允许出口厂商自行直接进口他们的投入品，无需通过授权的进口公司来进口，后者经常是提高了进口成本。

紧跟着的一个改革计划砍掉了非关税进口限制，一些品目从进口限制档次清单中降格，另一些品目划入不受限制的“一般进口”清单。关税税率朝着两个方向调整，一部分向下调是为了尽量降低成本和保护程度；另一部分向上调是为了把对某些商品的原有的非关税保护壁垒转变为关税方式。计划中的每一内容致力于两、三个行业的变革以便清楚地观察它对成本和效率的影响。纺织业、农产品加工业、塑料工业、化学工业、钢铁业、机械与设备制造业都被局部地或全部地解除了管制。在两年半的时间里，1200个非关税壁垒品目中的一半已全部摆脱了壁垒。实际上经济的每一个行业都受到了影响。

贸易解除管制是个尚未结束的故事。目前还存在一批保护政策，进口限制的存在还在抬高生产成本并打击出口者和消费者，对出口者本身也还存在一些限制。政府已经允诺要逐步放松这些束缚，进一步的计划已准备好要实施。近来，我们一直致力于通过降低非关税壁垒在制造行业引入竞争。今后的计划必将包括进一步的关税调整，要减低扭曲而进一步把价格理顺，要进一步降低保护壁垒让国内产品和进口品相竞争。向高代价经济的进攻将继续下去，这是我们促进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

五项解除管制的计划并不限于放松贸易限制。最近的（1988年11月）计划对岛屿间的船运完全解除了管制，简化或放松了许可证管理，因此使工业对外开放并面对更大的竞争。这一改革是对高代价经济的另一个主要攻势。其它的计划中还涉及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措施，包括放宽对本地人所有权的要求，特别是在高风险、高技术、资本需求量大的或出口比例高于85%的项目。

对金融市场解除管制我们已迈出一大步。改革的一揽子计划分别于1983年6月、1988年10月和11月宣布。第一个计划首先宣布废除所有的信贷封顶限额，允许银行对绝大多数种类的存贷款自行决定利率，减少了从印度尼西亚银行（中央银行）贴息的信贷的使用。最近的改革计划旨在增强金融领域的竞争，办法是拆除

1983年以来仍保留着的进入金融领域的壁垒（即限制成立金融企业的做法）。放宽了对外国银行的业务限制，新建银行分支机构的手续简化了，降低了银行申请从事外汇业务的要求条件。而且还减低了那些政府掌握所有权的金融机构所具有的特权和特别义务，降低了不同金融工具之间税收待遇的差别。

1988年10月的计划改善了我们促进货币市场发展的能力。办法有：将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降低2至15个百分点；在中央银行券的销售上引入拍卖制；把外汇掉期业务的期限从6个月放宽为3年；把掉期升水率按国内利率和离岸存款利率的差额来设置。货币控制从以往的直接干预转向了间接管理，办法是使用了更为复杂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金融工具。

1988年11月的计划旨在鼓励发展融资的长期来源。第一组办法是允许民营证券市场的开业并明确规定控制内部交易和其它不良行为的条例。第二组办法是鼓励新的金融服务的发展，比如风险投资、租赁、代理融通和信用卡。第三组办法是明确对各类保险公司的管理条例。目前还在进行有关养老金、互助投资基金或信托投资、保护消费者及投资者方面的立法。

这些金融改革与货币市场改革将加强金融市场上的竞争，鼓励利用新的渠道来作金融媒介并减少金融媒介的成本。金融市场的改革将通过增加储蓄并引导它们用于新的可盈利的出口工业及其它生产行业来支持贸易改革。

3. 改革政府机构

如果政府机构继续干预市场业务的话，我们在“理顺价格关系，发挥市场作用”方面的努力都不可能取得成效。在印尼，我们实行了一系列旨在支持市场导向改革的对政府机构的战略性改革。

最剧烈的要属1985年第四号总统指令了。这个法令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实际上废除印度尼西亚的海关机构，用一个国际评估公司SGS来取代了海关业务。总统大笔一挥，进口者从此免

于海关机构的腐败作风、货物入关的长时间耽搁以及货物从御船到运抵工厂所包含的高费用。几个月内，进口货船的清港从几个星期减少到了几天。作为结构调整过程早期的事件，它给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政府有决心去纠正“高代价”经济。

然而，这一改革也尚未完结。让本国的海关机关靠边站了，现在我们需要让它回来工作，让海关进行大检查以便它能对进口者和政府提供可信的、高效率的有效服务。事实上，我们将有一个本国的海关作为执行关税和其它贸易政策的有效工具。

对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也同样要有机构改革的支持。前面我已经谈到通过中央银行券的拍卖来发展金融市场，为使这种拍卖有效，也为使中央银行充分发挥其管理货币供应量的潜力，发展对中央银行券的二级市场是很重要的。1988年10月的计划提供了这种市场，但银行家们却对使用这一市场犹豫不决。我们现在面临着为高质量的短期票据的有效二级市场创建新机构及新手续的任务。为此，我们必须鼓励金融机构及其它厂商把这种新的机制纳入他们的有价证券管理的决策中。简言之，我们需要创建一个能作为金融体系中心和能够引导所有的融资价格趋向均衡值的新的货币市场。

前面我强调了刺激农村发展和保护农村收入的重要性，鉴于这种考虑，我们还把金融改革扩展到了农村地区。通过印尼的BRI银行，用建立在市场利率基础上的农村储蓄计划和农村贷款计划取代以前的定向贴息贷款计划。这个改革要求BRI银行的乡村分支机构不再按官僚行政机构下属单位的方式办事，而是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实业机构。

BRI银行改革的办法之一是走向市场导向：它们的乡村分支机构得到现金和其它的激励要求，使他们的行为转为银行家方式。但是其人员要改变行为方式还需要指导和训练。信贷决策的责任必须从地区分支行下放到乡村分支机构，而地区分支行需要放弃过去习惯于强调控制作用的方式而变为更加促进性的方式。总

的来说，象BRI银行这样复杂的机构的这种转变需要精心策划、精心执行。这就是机构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在这方面我们成功了。其结果，农村储蓄者能得到应有的利息报酬，农场和其它的信贷使用者按商业条件去寻求和运用信贷。

四、进度与顺序问题

我们从专家们那里听到许多关于结构调整的好处及必须进行价格改革来实现这些好处，但是从专家们那里听到的关于改革的顺序应如何选择的议论却少得多。比如，外贸改革应放在资本市场改革之前还是之后？什么时间应放松对外国资本的限制？我必须说明，把顺序搞错了是会断送改革的。

关于顺序问题。印尼是在经济严重扭曲的条件下步入结构调整阶段的。目前，外汇交易已存在了20年，且我们几次按需要调整了高估的汇率。通过限制性劳工协议或工资控制，我们放开了对劳动力市场的束缚。如你们所见，最近几年在减少贸易政策扭曲方面取得了进步。效果之一是制造业出口比以前更有盈利了，这方面投资的信号变得很清晰。然而还存在着偏袒一些低效率的进口替代行业的扭曲，改变市场信号的过程还未走完。我们能判断仍有一些投资流入低效的项目。

然而，我们必须走向解除管制并发展国内金融市场，还要让外国投资者更容易进入印尼自己的市场。这意味着有某种必要继续监督那些正在进行投资的行业。投资限制按说不是结构调整要搞出的经济制度，然而它可以是暂时有用的对策来防止在那些改革未全面开展的行业中的投资偏差。我们能在拆除尚存在的贸易政策所致的扭曲方面走得愈快，就能在减少投资限制方面走得愈快。

有些国家，特别是某些拉美国家，在放开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就放开了外国资本流动，结果出现了麻烦。一些专家曾对拉美